

文章编号:1674-8107(2014)01-0022-05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形态的选择 与游击战思想的运行原理

周宇清

(内江师范学院政法与历史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 战争形态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毛泽东所倡导和实践的游击战争是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争形态。敌我实力的巨大悬殊是实行游击战的必然因素。中国地域的广阔和地形的复杂多样、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不断斗争,为游击战争提供了持续下去的现实空间和政治条件。游击战真正发挥效用,还必须与其他战争形态和革命形式的配合,要有高度的政治动员和有效的政权建设,还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壮大革命力量。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是有其哲学依据的,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及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原理即是其能够畅行的深层的哲学根据。

关键词: 战争形态;毛泽东;游击战;运行原理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4.01.004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最常用的三种战争形态,尤其是毛泽东倡导和实践的游击战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和抗日战争前期发挥出巨大的效能,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二次国内战争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是这种所谓的正规战争也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1](P549)}。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1](P549)}。“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1](P449)}。“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1](P405)}。

游击战既然如此重要和伟大,审视这种战争形态。之所以发生的因素和存在的条件,探寻与之相配合使之有效实施的其他战争形态及革命形式,探究它背后深藏的哲学原理以及它的实践者基于这些原理作出的对形势的判断和预测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游击战发生的因素和存在的条件

战争形态是不能主观选择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向来主张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化实事求是地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P109)},崇尚“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2](P116)}的思想路线。就战争实际而言,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是实行游击战的必然因素。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不对称战争,敌人力量强大,革命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上井冈山时,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余人。毛、朱会师树起红军第四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三千余人。转入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

收稿日期:2013-10-18

作者简介:周宇清(1974-),男,安徽肥西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

也不过三万余人”^{[3](P78-79)}。人数少,“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只有几百人”^{[4](P26)}。“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4](P64)}。“大多数人没有打过仗”。“武器极少”,而且原始、简陋,使用的武器是“梭镖和大刀”^{[4](P26-27)}。“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枪枝的数量极其有限,“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2](P66)},但是却常常要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4](P34)}。

抗日战争时期,敌我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也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1](P447)}。而中国方面,“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1](P449)}。抗战初期,由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的三个师再加上总部直属队,全军才4.6万人,由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全军仅1.03万余人^{[5](P108-109)}。敌人在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方面占有显然的优势^{[1](P485)}。

除了军队人数、装备和军事素养方面的明显劣势外,共产党的组织、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工业实力、后勤补给能力等都有待壮大和提高。如此态势,规定了革命力量不能与敌对势力进行直接的、正规的决战,只能采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消耗敌人,保存并发展自己,积累经验,在一个长时段内积蓄力量,最终使己方力量达到和超越敌方力量,变弱势为强势,即只能实行游击战争。

游击战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是需要条件的,中国地域的广阔和地形的复杂多样,为游击战提供了回旋的现实空间。比如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就是因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的自然条件,其他根据地也有各具特色的自然优势,这是游击战能够长期坚持的地理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这种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优势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强敌入侵,猖狂一时,“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

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1](P405)},于是,人民军队就在这些“空虚的地方”大显身手了。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两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1](P444)}。

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不断争斗是游击战能够持续下去的政治条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各派军阀割据纷争,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矛盾和裂痕,这就为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场所。日本的侵略,也产生了大致相似的结果,“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6](P390)}。这些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正是由于有着如此之多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才觉察到游击战的巨大价值,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说:“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办法,“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2](P104)}。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多次电示前方将领,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要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游击战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7](P53)},竟将游击战争的地位提升到战略的高度^{[1](P404-406)}。

二、其他战争形态和革命形式的有效配合

游击战尽管是适合中国革命形势的有效战争形态,但游击战不是唯一的战争形态,仅仅是游击战争不能将革命最终引向胜利,游击战真正有效和发挥作用,必须根据形势适时地与其他战争形态紧密配合。这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整个中国战局来说,在抗战的防御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1](P463)};在相持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1](P464)};

反攻阶段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1](P466)}。这就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在各个战争时段里的地位及相互间的关系。

游击战必然是持久战,从整个革命战争形态来说是持久战,但就个别战斗而言,又要求是速决战。作为抗战中大显神威的游击战,还要处理好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从而夺取革命的胜利。“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1](P415)}。这是从军事策略层面保障游击战的成功实施。

单纯的军事斗争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与其他革命形式相结合。“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1](P54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1](P543)}。

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政治动员,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政治动员,不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这样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2](P104)}“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1](P492)}。

抗日战争时期,动员人民群众尤为重要,“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1](P455)}。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可以弥补武器等等不如人的缺陷。“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

争困难的前提”^{[1](P480)}。

要重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树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总体观念,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没有革命的武装固然不会有革命的政权,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壮大人民武装,“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政权,“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从而“促进革命的高潮”^{[2](P98-99)}。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他们积极支持革命战争以保卫胜利成果,为游击战争的运行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P741)}。在这个政权里,“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1](P742)}。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团结地主中的开明分子,打击不法地主,减轻人民负担,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去做抗日的神圣事业。“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1](P376)}。

还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革命力量的弱小不得不实行游击战争,为了给革命力量营造出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必须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并将国内统一战线扩展到国际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奋斗。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异常强大和凶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得特别重要。“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1](P347)}。不仅是国内各方力量要团结

一致,还要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力量。“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1](P451)}。“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6](P403)}。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6](P390-391)}。把国内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6](P401)}。总之,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最大限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配合军事斗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三、游击战运行的哲学原理

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是有它深厚的哲学原理的。首先是对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运用。敌对势力之间的缝隙是游击战发生的潜在空间。近代中国社会是各种矛盾的集合,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并非同等地存在着,革命力量在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容易产生,而矛盾的继续深化又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样便给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发生和坚持下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2](P49)}。

抗日战争时期,这种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1](P444)}。也就是侵略者虽然占有了相当广大的土地,但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经济力量、战略空间和战争潜力。

再者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理解。之所以实行游击战是因为革命力量弱小,但游击战不是目的,而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路径和方式。创建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由量变到质变,中国社会发生局部质变,革命进程发生阶段性质变。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2](P50)},当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形势发展了,就会使得游击战向运动战方向转变,朱毛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区和红军发展壮大,游击战开始向运动战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3](P1)}。中国是一个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各地革命形势并不完全一致,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逐渐壮大革命力量,促进革命形势高潮的到来。质量互变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使得革命高潮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P106)}。这种对局势的预测和期待是革命必定成功信念的反映,也是长期支撑革命的一种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的游击战的用意也在于积蓄革命力量,以创造和等待有利的革命形势,而这种对形势好转的预测也是有根据的,源于中国自身的变化和演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沉沦,《辛丑条约》后沉沦到谷底,从此开始转折,逐渐上升,经过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步的因素在增多,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1](P451)}。具体的做法是,“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来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1](P489-490)}。即是由小的、局部的胜利演进到巨大的、全局性的胜利。

再次是对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原理的认知。中国的战争与国际局势是紧密联系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纠葛,使得国内的战争有着或多或少的国际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战时期,中国的战争与国际局势的关系更为直接了,“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1](P467)}。这样,“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

是孤立的”,世界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人民会给予中国直接和间接的援助,“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1](P452)}。而中国所进行的长期的残酷的游击战也不会停止在原来的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1](P499)}。毛泽东以敏锐的视角、辩证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优势

和劣势,意图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增进优势因素、降低不利因素,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最终把革命引向胜利。

毛泽东是杰出的辩证法大师,他把辩证哲学的理论成功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使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达到完全的胜利。今天,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再次审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 and 实践,其间闪烁的辩证法的光彩依然熠熠生辉。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 杨得志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 [6]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毛泽东军事文集(抗日战争时期)[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On Mao Zedong's Thought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Forms and His Principles of Guerrilla War

ZHOU Yu-qing

(School of Politics, Law and History,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641112, China)

Abstract: War forms are decided by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s, the guerrilla war advanced and practised by Mao Zedong is a form suitable for Chinese revolutionary realities. The great gap between revolutionary and enemy forces leads to the necessity of such a form. The vast territory, the diverse land forms and consistent conflicts between dominating classes and imperialist powers provide practical rooms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continuation of the war. Nevertheless, effective guerrilla war needs supports of other war forms and revolution forms, efficien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regi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united front which arises all positive factors for revolution. The success of guerrilla war is philosophically rational in its utilization of the laws of uneven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changes,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 and the eter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war forms; Mao Zedong; guerrilla war; principles

(责任编辑:韩 曦)